

荐阅 书单

《大山里的小诗人》

乡村诗歌教育曾经是一个鲜少有人提及的领域,公益组织“是光诗歌”在四年的时间里,让64700名孩子体验了人生中的第一堂诗歌课,《大山里的小诗人》一书中的诗,正来自于这些孩子。

孩子的语言往往出人意料,却又富含趣味和想象。对于这些生活在山里的孩子们来说,生活给了他们比很多同龄人更多的考验……但诗歌让美和光的力量在孩子的心中生根、发芽。“放学回家的路长长的/只有我一个/家里的牛圈大大的/只有小牛一头/当我抱住它的时候/我们都有了朋友。”这些脱胎于“小诗人”常态化生活的作品,也许略显苦涩和单薄,却清新质朴,闪烁着动人的光泽。



作者:『是光』的孩子们  
编者:果麦  
版本:果麦—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时间:2020年4月

《每个人都重要》

表面看来,这是一本玩数字游戏的图画书,但实际上,它是一本包含着我们每个人生命故事的推理书。在这个奇妙的游戏里,作者埋下了许多隐秘的线索,每个数字背后都隐藏着不同性格与样貌的人,每条线索都在开启一个新故事,小读者被邀请进入书中,去寻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以及其中的故事,由此获得极大的观察和侦探乐趣。

譬如两个人在森林里,一个人正在说的话,另一个人将铭记终生;两个陌生的人,当他们相恋并最终结婚的时候,并不知道彼此曾经搭乘过同一班电梯,而当时的他们都曾觉得自己是如此孤独。当孩子变成侦探时,同时也获得了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版本的成就感和价值感。



作者:(挪威)克莉丝汀·罗希夫特  
译者:邹雯燕  
版本:奇想国—明天出版社  
时间:2020年6月

《城市的语言》

关于城市,我们听过很多关于中国或西方的古老故事。水源、食物和交通曾决定着一个城市的繁荣与发展。但是《城市的语言》展示了现代城市不一样的生长逻辑。在全球水资源最为匮乏的沙漠国家阿联酋,发展出了拥有全球最高建筑和最大人工岛的旅游城市迪拜;世界市值最高的四家公司,有三家诞生于美国旧金山湾区一片弃用的海军基地,这里不是一个行政区域,在地图上甚至找不到名字,却因其孕育的高科技产业而得名“硅谷”。

当技术的发展使得自然因素不再成为人类开拓城市的阻碍,是什么定义了现代城市?作者迪耶·萨迪奇通过本书证明,城市既是一件艺术品,也是一个道德系统和技术体系,同时反映着一种人们共同的生活方式。

(杨道 辑)



作者:(英)迪耶·萨迪奇  
译者:张孝铎  
版本:启皓文化—东方出版社  
时间:2020年5月

《现代性的追寻》：  
诗的“知音之悦”

文|林颐

“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/梅花便落了下来……”《镜中》被视为张枣的代表作,评论界认为它鲜明地亮出了张枣的诗歌方法论。用张枣自己的话来说,这种方法论就是“从汉语古典精神中衍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”。

《镜中》写于1984年,那时张枣23岁,考入重庆的四川外国语学院读研究生。“在四川,青年诗人们像红汤火锅那样热腾腾滚起来,忙于假想或实际的诗歌江湖……”(陈东东《亲爱的张枣》)。张枣进入了这个磁场,很快也成为了一个磁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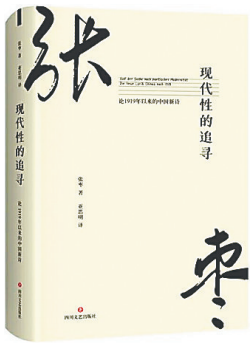
张枣少年早慧,16岁就考入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专业,20来岁就在诗坛成名。写出《镜中》之时,张枣对新诗创作及理论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,这个理解就是围绕着“现代性”的追寻,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,张枣继续向着新诗创作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思考。

《现代性的追寻》的副标题叫“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”。为什么时间点放在1919年呢?因为,张枣曾将“对‘现代性’的追求”称为“白话文学运动另一桩未了的心事”。谈论中国

新诗离不开新文化运动这个大的背景。新诗在当时被称为白话诗,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浓厚的启蒙色彩,就是与社会思潮联系在一起的。回顾新诗的历史,有破坏,有建设,破坏的目的是为了建设。新诗的成熟伴随着对文学本质认识的加深,对西方诗歌的创作方法的移植及借鉴,然后再经过内部艰难的消化、吸收和新的传统的构建过程。

张枣认为,“一种存在的语言反思和批判立场,使得写作者面对创作过程以及自身姿态的意识都得以强化,这是现代诗最显著的标志之一。”胡适的《尝试集》是公认的首部白话诗集,但在张枣看来,这一标志没有出现在《尝试集》里,鲁迅的《野草》反而更加符合。张枣致力于重新阐释《野草》,认为它是第一代白话诗人追寻现代性的代表性例证。

张枣用“现代性”的视角把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诗人重新划分为四代:第一代诗人由早期的文学先锋组成,以鲁迅为代表。第二代囊括了李金发以及其他的一些象征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,比如冯至。第三代包括了戴望舒、卞之琳、废名跟其他的“现代



《现代性的追寻: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》  
作者:张枣  
版本:四川文艺出版社  
时间:2020年8月

派”。第四代主要由1940年代的诗人构成,比如穆旦、郑敏、陈敬容等。这些诗人既具有个性又有共性地探索着新的诗歌形式,来配合他们的诗的主体性表达。

张枣曾经说过,“文学是寻找知音的活动”,他文学活动中最重大的事件,就是1984年与柏桦的相识。1985年早春,北岛走进张枣的宿舍,那是另一段恒久的友情的开端。张枣去世之后,陈东东在纪念文章里,把《镜中》形容为“知音之悦”,映照以印证,以构筑起超物理维度的精神空间,与尔同销万古愁。

在更广大的意义上,《现代性的追寻》或可视为张枣超时空的一场场诗的“知音之悦”。

《文史资料编撰读本》：  
一部史料工作的行动指南

文|曾庆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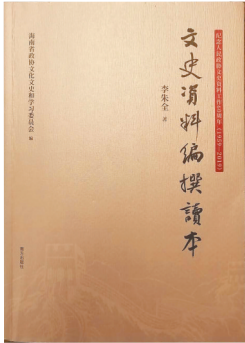
在日常生活中,人们习惯于用“十年如一日”形容长时间坚定不移地执着于同一件事。我总以为,这多少属于溢美之词,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各样原因,真正能够做到“十年如一日”的实在是少之又少。李朱全的《文史资料编撰读本》真正让人领悟到“十年如一日”坚守而成就的绚烂之花。执着者自成高格,这是《文史资料编撰读本》给我们的启示。

经过几十年的发展,以“亲历、亲见、亲闻”为基本出发点的文史资料成为各级政协的基本工作之一。文史资料的重要性早已经为大众知晓,但是相比各种闪光度很高的各种史书而言,以资料见长的文史资料更多的属于基础性工作和幕后工作,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给史学研究者作嫁衣,因此大众实际上了解并不太多。李朱全十几年来一直坚守在文史资料工作这块阵地上,在他的积极策划下,先后推出一系列主题集中却又分量颇重的文史资料集,比如《海南天然橡胶事业》《亲历海南省》《琼剧亲历见闻录》《知青在海南史料选编》等,为海南历史研究留下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。因此,李朱全这十多年的执着坚守是有价值的。

文史资料提供的信息都是当事人“亲历、亲见、亲闻”,对于文史资料工作的组织者来说,似乎等着当事人写出稿件进行适度编辑处理即可。但是,这种“等米下锅”的做法最终只能陷入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的尴尬。因此,从感同身受出发的李朱全大声疾呼,要做好文

史资料工作,应当从先前的“等米下锅”走向“找米下锅”,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。海南文史资料之所以不断推出厚重之作,就和这种积极主动作为大有关系。当然,“找米下锅”只是做好文史资料工作中的一个环节。李朱全在自己十几年文史资料一线工作实践中,勤于思考,善于总结,最终形成《文史资料编撰读本》,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史资料工作的行动指南。

在《文史资料编撰读本》中,李朱全从规划选题、协作组稿、指导撰稿、审稿编辑等多个方面谈及自己在文史资料工作中的心得体会,没有高深的理论,一切都是从实际工作出发,从而总结和提炼出相应的“干货”,能给人以诸多启发。比如,他认为文史资料工作组织者应当担当起“组织、发动、规划、指导、服务”等多重职责和功能,是能够得到大家公认的。在具体的资料征集和撰写中,他总结出“一找二保三给”,即“找米下锅”“保持‘三亲’特色,体现存真求实;保持鲜为人知,体现拾遗补漏”“把篇幅留给史料、把评论让给读者、把精神传给后人”,这把文史资料工作中积极主动、内容定位以及情感定位表述得非常生动,既有高度又接地气,能够对文史资料工作产生相应的推动。在《文史资料编撰读本》中,像这样站在一定高度来回望、总结文史资料各项工作的观点还有很多,看似平常,却又不是老调重弹,而是处处结合工作实践加以总结提升,体现了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



《文史资料编撰读本》  
编者:李朱全  
版本:南方出版社  
时间:2019年12月

循环往复的过程。

《文史资料编撰读本》是关于文史资料工作的一部行动指南。为了强化生动可读性和现实可操作性,李朱全还根据工作经历选择了不少案例。比如,关于“海南建省”这一重要的选题从资料征集到最终以《亲历海南省》三册150万字的篇幅成书,中间经历过一系列故事,李朱全作为实际工作的参与者和组织者,将背后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娓娓道来,一方面让读者对文史资料工作有了更为切实的了解,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可读性和情感性。十几个案例的总结,体现了著者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守。若干年后,我们再来阅读这本书,它或许也将成为文史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,即海南文史资料工作几十年的发展历程,也可以纳入海南文史资料征集的选题之一,李朱全关于海南文史资料的“亲历、亲见、亲闻”,应当是绕不过去的,也是值得挖掘的。李朱全为海南文史资料工作留下一笔鲜活的史料。如是观之,可谓是“十年辛苦不寻常”!